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35

吴敬琏 主编

蔡昉 孟昕 白南生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问题

李实 魏众等

中国经济改革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

乔治·阿克洛夫

宏观经济学中遗漏的动机

卡门·雷恩哈特 肯尼思·罗高夫

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非常与众不同吗？

托马斯·赫因

在发展中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托马斯·谢林

广岛的遗产

高世楫

OECD国家监管改革历程及其启示

迪特尔·赫尔姆

监管改革、监管俘获和监管负担

艾伦·施瓦兹 罗伯特·斯科特

合同订立前的法律责任和初步协议

世界银行

东亚各国的腐败模式与反腐趋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35

吴敬琏 主编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第35辑/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086-1108-2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2824 号

比较·第三十五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 14 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1108-2/F · 130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卷首语

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856美元，到2006年人均GDP首次超过了2000美元，按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描述的前景，2020年实现人均GDP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中国人均GDP将达到3500美元左右。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亦即从落后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是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过渡时期，必须小心避免三个潜在的陷阱：管理不善的城市、冲突的社会和腐败的政府。根据诺思等学者的定义，这是一个从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走向基本型有限准入秩序的社会发展阶段，重中之重是建立更完善的政府机构，改进其服务能力，创造有利于整个社会各类组织能够持续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从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这样超常的城市化，需要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做出超常的回应。较差的服务和大规模的非正规劳动市场，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劳动力转移面临的制度障碍等问题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确实是关系到中国能否成功地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重大课题。《比较》编辑室特邀请该领域的专家蔡昉、孟昕和白南生从不同视角讨论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问题。他们指出：城市化是推动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不可避免的过程，是当前的一些制度因素阻碍了余下劳动力的转移，也制约了农民工获得平等的权利。我们必须意识到，要把剩下的、“边际”的劳动力转移出来，会有更大的制度挑战。绝不能单靠某项政策来推动，而是应该有更宏大的视角，将人口政策、劳动力流动政策、劳动力市场，还有产业升级和转移政策等等放在一起考虑。

李实教授等《中国经济改革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一文利用1995~2002年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城镇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对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

的职工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城镇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收入决定中的分割效应不仅存在，而且仍有不断增强的趋势”。本文的分析表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正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工资决定的市场化机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变得更加明显；二是市场分割效应明显增强。

“前沿”栏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在美国经济学会第 190 次会议上发表的演讲《宏观经济学中遗漏的动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试图重建宏观经济学。在这个重建过程中，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五个中性论：消费与当期收入无关（生命周期永久性收入假说）；当前利润与投资支出无关（莫迪格里亚尼—米勒定理）；长期通胀率与失业率无关（自然失业率理论）；货币政策无法改变总产出（理性预期假说）；税收和财政赤字无法改变消费（李嘉图等价）。这五个中性论能让宏观经济学更为坚实、更能解释现实吗？阿克洛夫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五个中性论遗漏了经济决策者的动机，而这个动机就是经济决策者对“他本人以及其他人应该做什么”持有的看法，阿克洛夫称之为“规范”。他认为，将规范纳入决策者的目标函数才能为宏观经济学建立更坚实的理论 and 现实基础。从阿克洛夫的这篇演讲中，我们看到了经济学正在前进的方向，也看到了经济学的活力。尽管最近十几年来，经济学并没有出现令人振奋的革命性突破，但是经济学家们正在努力地向其他学科学习，例如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物理学和生物学。

美国次贷危机是 2007 年的热点词汇之一，针对这次危机，本辑的“金融评论”选取了两篇文章。一篇是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罗高夫等人的《2007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非常与众不同吗？》，文章将本次危机与二战以来发生的 19 次以银行为主的金融危机比较后指出，2007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资产价格上涨、债务负担加剧、增长率波动、经常账户赤字等爆发前的许多指标上都与以往的危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这次危机与众不同”。文章认为，许多不受监管或缺乏严格监管的新型金融机构在融资体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是金融系统面临冲击时更为脆弱的因素之一。另一篇《在发展中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来自美国堪萨斯州联储银行行长托马斯·赫因。本文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引子，总结了金融体系在近期的演进发展。目前，全球金融体系变化的突出特征是金融体系正在由银行主导转向市场主导，金融体系功能的正常发挥有赖于众多的代理机构，而这种金融结构的演进就导致了

金融危机的性质和区域都出现了变化。作者强调四个方面的政策问题：流动性问题、信息披露、激励问题和道德风险，以期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思考，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在发展中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本辑的“视界”栏目收录的是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大师托马斯·谢林在 2005 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令人惊讶的 60 年：广岛的遗产》是谢林的博弈论应用在军控理论和国际关系决策上的范文。开篇就提到，过去的六十多年最重要的事是有件事没有发生：地球上没有爆发核大战。文章讲述了正是人们对“核禁忌”以及核报复风险的共识使核战争的发动成为不可能，虽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杜勒斯们屡屡希望将核武器常规化。谢林在文章最后对美国政府提出警示：核禁忌才是真正符合美国利益之所在。

“比较制度分析”栏目下是两篇有关监管的文章，对于当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方面改革，具有极大的比较借鉴意义。高世楫的《OECD 国家监管改革的历程和启示》一文首先描述了 OECD 国家监管改革的内容和历程，对其成员国的改革经验进行了总结。OECD 所提出的监管改革的原则、工具和改进监管有效性的具体做法，实际上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内容和范畴。而牛津大学的迪特尔·赫尔姆的《监管改进、监管俘获与监管负担》一文，是对近年来监管理论、监管改革等问题的梳理，因内容详实，也是我们了解当前发达国家在监管领域的讨论和行动的窗口。

“法和经济学”栏目提供的是艾伦·施瓦兹和罗伯特·斯科特的《合同订立前的法律责任和初步协议》。文章对目前引起广泛诉讼的关系专用型投资下的“初步协议”进行了分析。与主流学术观点不同，他们认为，法院对有效率的项目的推动作用被低估了：法院不仅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合同为商业行为提供便利，也可以通过赋予初步协议以法律约束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法院有时会犯错误，要么没有强制执行初步协议，要么在执行时适用了一个不够严密且过于宽泛的背信定义。他们为法院提供了一个处理早期信赖投资案例的框架，可以提高法院的效率。

“新书架”是即将出版的世界银行《东亚复兴》中“反腐败”一章的节选。“腐败”一直是阻挠很多国家发展的问题。但因东亚国家出现的高腐败和高增长共存的局面，有学者称其为“东亚悖论”。作者将经济学理论中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整理，是人们研究腐败问题时很有用的分析框架。文章

指出，全球化背景下，许多条件发生了变化，那种集权式腐败——可以在控制下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土壤，东亚各国要求革新政府治理、减少腐败的呼声不断高涨。投资者和贸易伙伴也都不再希望继续去消化腐败带来的额外成本和风险。反腐败的重要性正在提高，东亚各国的政府治理正从“人治”走向“法治”，从集权走向分权，虽然这些变化短期内可能还不能改变腐败的局面，但长期来说，却是正确的方向。

目 录

Contents

第三十五辑

- 1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问题 蔡昉 孟昕 白南生
The Problem of the Labor Force in the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by Cai Fang, Meng Xin and Bai Nansheng
- 13 中国经济改革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同所有制职工
工资收入差距的分析
西尔维·德米尔热 马丁·富尼耶 李实 魏众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with Rising Segmentation in China's Urban
Labor Market
by Sylvie Démurger, Martin Fournier, Li Shi and Wei Zhong

前沿

Guide

- 28 宏观经济学中遗漏的动机 乔治·阿克洛夫
The Missing Motivation in Macroeconomics *by George A. Akerlof*

金融评论

Financial Review

- 68 2007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非常与众不同吗? 国际历史比较

卡门·雷恩哈特 肯尼思·罗高夫

Is the 2007 U.S. Sub-Prime Financial Crisis So Different? An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mparison

by Carmen M. Reinhart and Kenneth S. Rogoff

- 76 在发展中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再次汲取历史教训?

托马斯·赫因

Maintaining Stability in a Changing Financial System: Some Lessons Relearned Again?

by Thomas M. Hoenig

视界

Horizons

- 86 令人惊讶的 60 年: 广岛的遗产

托马斯·谢林

An Astonishing 60 Years: The Legacy of Hiroshima

by Thomas C. Schelling

比较制度分析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 98 OECD 国家监管改革历程和启示

高世楫

The Inspiration and Process of the Regulatory Reform in the OECD Countries

by Gao Shiji

- 106 监管改革、监管俘获与监管负担

迪特尔·赫尔姆

Regulatory Reform, Capture, and the Regulatory Burden

by Dieter Helm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134 合同订立前的法律责任和初步协议

艾伦·施瓦兹 罗伯特·斯科特

Precontractual Liability and Preliminary Agreements

by Alan Schwartz and Robert E. Scott

新书架

New Books

174 东亚各国的腐败模式与反腐趋势

爱德华·蒙特菲尔德 塞伦·奥泽

The Corruption Model and Anti-Corruption Trend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By Edward Mountfield and Ceren Ozer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问题

蔡昉 孟昕 白南生

编者按：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的阶段。恰好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回顾中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充裕的劳动力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是经济快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当前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做出判断，准确把握劳动力供求的长期变动趋势，正确认识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含义，对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利于我们预测中国经济近中期的特征变化趋势。然而，对这个问题，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策界都有不同的观点，无论是与我们处于相同转型阶段的东南亚国家还是曾经经历了这一阶段的日本和韩国，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

《比较》一直非常关注劳动力问题，我们曾先后发表过国内外专家有关劳动力市场监管、就业、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状况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论文。针对当前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我们特意邀请该领域的专家蔡昉、孟昕和白南生进行讨论，我们把这些还没有形成定论的观点介绍给大家，以期推动学界和政策界对这一话题展开更多的讨论和交流。

* 本文由《比较》编辑室编辑孟凡玲根据作者发言的录音整理而成。——编者注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终结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在经历近 30 年的高速增长和成功的经济改革之后, 坚持认为中国农村仍然有高比例、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的观点, 已经成为缺乏经验证据的教条, 妨碍我们对劳动力市场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的调查表明,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来源, 已经大幅度下降。21 世纪以来, 农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特别快, 也就是说劳动力剩余的减少特别快。我们估计, 在目前的条件下, 农村还只有几千万现成的劳动力可以转移。这几千万之所以还留在农村, 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转移能力比较低 (见图 1 和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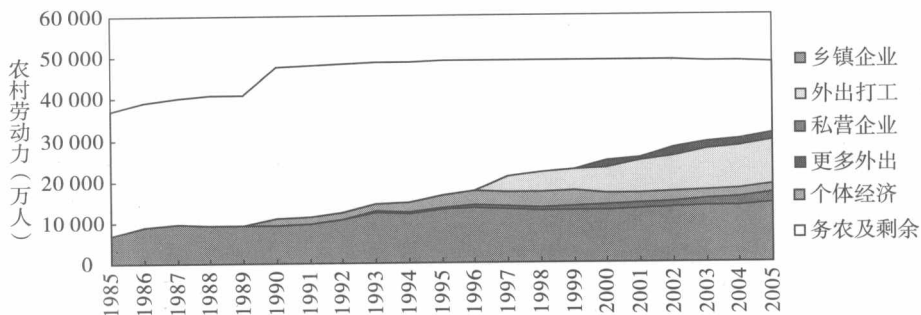


图1 农村劳动力配置状况变化示意图

说明: 本图是根据实际数据绘制的。但是, 由于外出劳动力的统计和农村非农产业就业的统计有重合, 故本图只作为示意图。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农民工人数来源请参见蔡昉 (2006), 以及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历年。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最重要领域是乡镇企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 乡镇企业是农村非农产业就业的主要贡献者。虽然这个部门在吸收了大量劳动力之后,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 但是, 近年来乡镇企业就业不仅恢复到当时的绝对水平, 而且获得了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2006 年乡镇企业总就业达到 1.47 亿, 为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 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成为农村越来越重要的就业吸纳部分, 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就业增长速度减缓的 1996 ~ 2003 年期间, 支撑农村非农就业得以增长而没有停顿。1996 ~ 2006 年期间, 乡镇企业就业增长了 11%, 而私营企业增长了 4 倍, 最终实现的农村非农就业, 在 10 年间增加了 2 373 万人。另外一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向就是跨地区外出打工。根据一个来源, 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从 1997 年的 3 890 万, 增加到 2005 年

的 1.08 亿。根据另外一个来源，农村劳动力外出规模更大一些，从 2000 年的 7 849 万增加到 2006 年的 1.32 亿。为了反映这个更大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我们将其超出前一数字的部分也画在图 1 中。

我们可以对各种可能的农村劳动力剩余状况做出估计。按照农村劳动力总规模 4.85 亿估算，如果我们选取比较大的劳动力转移规模，即占全部农村劳动力 48%，因而总量为 2.3 亿，并且选取农业需求劳动力 2.3 亿的话，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只有 2 481 万。在这种情形下，农业劳动力的使用存在季节性不均匀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形比较符合农业劳动的季节性特点，也为劳动力利用边际剩余劳动时间从事林业等劳动提供了余地。如果选取同一劳动力转移规模，并假设农业尚需劳动力 1.9 亿的话，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只有 6 279 万。这种农业劳动力使用相对紧凑，为估算实际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一个比较保守的假设。如果选取最小的劳动力转移规模即 2 亿，同时假设农业尚需劳动力 1.8 亿的话，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为 1.07 亿，剩余比例为 22%。这种农业劳动力利用程度，可以说是“满打满算”的。

显然，上述三种情形可以说囊括了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可能状况。我们采用最保守的估计，即假设仍有 1.07 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数字作为基础，再来看处于不同配置状况的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首先，借用 2005 年农业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分布，我们把 4.85 亿乡村从业人员按照年龄划分为 5 个组别。其次，根据抽样调查的数据，我们还可以知道农村外出打工人员的年龄分布，并把 1.08 亿农村外出劳动力划分为相同数量的组别。我们可以看到，与乡村全部从业人员相比，外出劳动力更多地集中在年轻的年龄组内。第三，我们再看在农村就地转移劳动力的年龄分布。根据以往的研究，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向外转移的意愿是，首先选择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其次选择外出打工，最后的选择是务农。因此，选择就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条件也可以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排列。年龄作为影响劳动者争取收入的能力的一个重要人口特征，也是按照类似的顺序排列的。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假设，在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与外出打工者相同。第四，我们假设务农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与留在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结构相同。最后，我们分年龄组把农村就业人员分别减去外出劳动力、就地转移劳动力和务农劳动力，就可以得到剩余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图 2）。我们可以发现，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 50% 年龄在 40 岁及以上，也就是说，40 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 5 212 万，剩余比例仅为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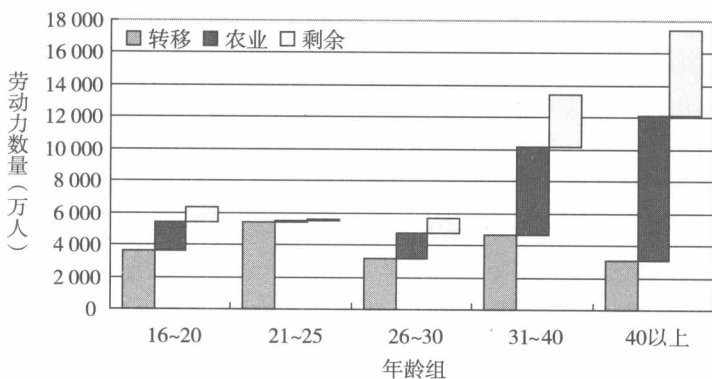


图2 转移、未转移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与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1）乡村从业人员数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2）乡村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系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所做的预测获得；（3）外出打工人员结构来自盛来运、彭丽荃（2006）。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下降主要与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变有关。中国的死亡率自解放以后就下降了。部分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下降，目前中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2.1的更替水平，为1.7。这意味着少儿在人口中的比重下降。由此导致，以后各阶段成长为劳动人口的人数也会比较少。也就是说，我们将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将呈下降趋势，预计在“十一五”期间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在设定的高位非农产业增长率和高位非农产业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两者差距会越来越大。在其他的非农产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假设下，2010年之前，也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数量的情况。^①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时刻，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消失，从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基于上面人口结构的预测与分析，可以确定，这两年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到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

在学术界，在发展经济学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来没有统一认识，也没有任何人能提出大家普遍接受的计算方案，所以，这里说的“刘易斯转折点”强调的只是一个变化，即可供转移的越来越少，但不是说没有可转移

^① 参见蔡昉，《认识中国劳动力市场及其变化趋势》，《比较》第30辑，中信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的了。不过，按照刘易斯本人的说法，经济发展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是指：对劳动力需求的满足必须引起工资上涨，二元经济转变加快。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是指：两部门工资都由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二元经济结构消失。很显然，我们看到的还只是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汇集最新的一些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最近几年是增长的趋势。农民工工资 2003 年提高 0.7%，2004 年提高 2.8%，2005 年提高 6.5%，2006 年提高了 11.5%，2007 年则提高了 20%。另一方面，我们对城市职工工资和农民工工资做的分析都表明，区域间劳动力报酬出现了趋同的趋势，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前提下，工资的上涨无疑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强有力的证据。

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意味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终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包括破除一系列长期存在却过时的理论神话，也包括引申出重要的政策建议，以便未雨绸缪。

1. 增长可持续性含义。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所带来人口红利。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持续居高的条件下，生产要素投入不会遇到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期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因此，中国依靠单纯投入驱动型的增长方式，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实现了良好的增长绩效。作者曾经做过的一项估算表明，人口抚养比每下降 1 个百分点，人均 GDP 增长率提高 0.115 个百分点，即人口红利对人均 GDP 增长的贡献率至少为 26.8%。然而，上述增长因素关系反过来也是存在的，即人口抚养比每上升 1 个百分点，人均 GDP 增长率则会降低 0.115 个百分点。而根据预测，抚养比的上升将于 2013 年以后发生，届时人口红利就会逆转为人口负债。这意味着随着中国面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结束，迫切地需要从单纯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真谛），否则高速增长的源泉就会丧失。

2. 宏观经济含义。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普遍出现，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已经有上涨的倾向。由于普通劳动力短缺而导致的工资上涨，对范围最为广泛的中低收入家庭具有效果明显的收入提高效应，而这些家庭又具有对于普通商品的较高消费倾向，因而推动了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要驱动力的轻微通货膨胀。如果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足以扩大劳动参与程度，吸引足够的劳动力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则我们可以观察到劳动力短缺现象的消失或减轻。然而，这几年劳动力短缺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个事实则表明，上述工资上涨幅度并未达到结清劳动力市场的水平，普通商品消费需求的旺盛将继续保持一个轻微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这

种工资上涨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所支撑,因而不会危害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在1980~2005年期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属于最快的,年增长率达到5.7%,制造业则高达7.9%。不过,考虑到目前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还仅仅是开始,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仍然脆弱,通货膨胀有可能起一个阻止消费增长的作用。加上生产波动的因素,这将导致消费的复苏呈现时起时伏的态势。

3. 国际经济含义。中国充分利用自身人口红利推动高速增长,表现在中国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其比较优势获得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并形成庞大的贸易顺差。劳动力丰富并便宜,是中国国际贸易中享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主要原因,也给进口国家的居民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这个因素远比汇率的因素要真实。虽然劳动力长期供求关系的变化,必然转化为普通劳动者工资从而引发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并且已经反映在进口国家市场上中国产品价格的提高,然而,由于中国工资水平仍然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贸易伙伴尚有足够的空间消化这种通货膨胀效应,不会对中国产品的竞争力造成损害。在劳动力成本已经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应该更加稳妥,以避免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比较优势火上加油,以致过度压抑出口产业的增长速度,既伤害中国的国内就业,也冲击国外的中低收入消费者。

4. 制度变革含义。二元经济结构归根结底是一种制度扭曲现象,即一方面农村具有绵绵不断的劳动力过剩供给,另一方面制度性的因素也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例如在中国,为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畅通地流动制造了障碍的户籍制度,就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则意味着,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变化创造了根本变革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的条件。实际上,改革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重要新特点,就是政府越来越主动地适应现实中出现的制度需求,提供更有效率的制度服务。

错判将对农民工的转移和中国城市化进程产生很大影响

孟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

对于一个普通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可以根据分析以下几个问题来判断:城市非熟练工人(农民工)的工资是否开始加速增长?城市和农业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是否已经缩小?农村劳动力移动的比例有多大?但由于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在它的劳动力市场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简单根据一些表面现象下结论可能给中国是否已经到达或接近“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造成误导。

认为中国已经到达或接近“刘易斯转折点”的一个主要证据是近年来

非熟练工工资的增长。这个问题要从几方面来看。第一，非熟练工的工资是否增长了。第二，如果增长了，为什么？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农民工这个群体代表了非熟练工人。然而，反映他们的工资变化的有代表性的数据很少。根据对广州7个工厂（2004年总共23650个工人）的农民工工资数据的调查结果显示（见图3），2000~2004年非熟练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并不大，年平均增长率为2.8%。当然，这只是2004年及以前的情况。2004年以来有些地区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情况。有些数据表明，在2003~2006年间，农民工平均年工资增长达到了6%左右（蔡昉，2007）。然而，根据我们2007年对1000户在上海、无锡、广州、深圳的农民工的调查，农民工进城后第一个月的平均工资（更可靠地反映了非熟练工的工资）在这段时间内增长并不快，年均增长率为2.7%（见图4）。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04年以来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增长极快（见图5）。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政府的人文关怀政策的表现，而最低工资的增长可能对实际工资的增长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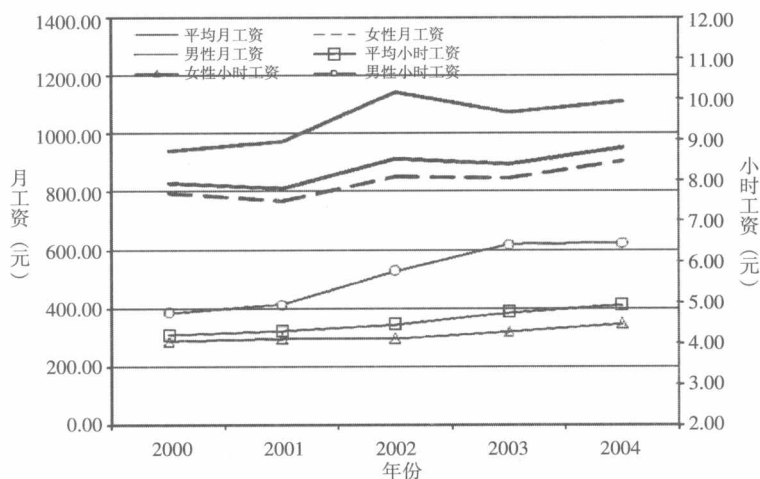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性别月工资和小时工资的变化：2000~2004年

有关这一阶段非熟练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还有待更可靠、更有代表性的数据的进一步支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近几年来中国很多城市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现象。那么这是否可以作为“刘易斯转折点”的另一表象呢？我以为不然。农民工短缺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或政策原因造成的，也有人口结构的原因。例如由于城乡分割的政策，农民工在城里不能长期安定下来。这就使得大部分本来可以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不得不滞留在农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农村总移民劳动力为1.14亿，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